

非常视点 跨省买房异地高考 已经行不通了

熊丙奇

据媒体报道,2月19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布的一份跨省组织高考作弊案终审判决书引发广泛关注。为了让孩子上大学,家长不惜跨省买房、迁户口、异地报名、重金找人替考,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高考作弊。这起案件的被告人,包括组织者、替考者、考生家长均获刑。

这样一起“跨省买房,迁户口,异地报名高考”事件是怎么运作成功的?这种运作实际是钻了西藏推进城镇化建设实行“购房入户”政策与高考报名规定的“空子”,以买房落户的方式,获得西藏户籍,报名参加西藏高考,而这“空子”已经于2020年“补上”了,再想通过买房落户以西藏考生身份报名西藏高考的运作,已经行不通了。

去年6月,西藏教育考试院发布《关于我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考条件规定的补充通知》明确,除在藏干部职工子女外,户籍从外省(区、市)迁入我区参加高考的考生,必须符合以下规定要求。“1.2021年参加高考的考生须具有西藏户籍1年以上(含1年)、西藏所属高中阶段学校学籍1年以上(含1年)、在藏高中阶段学校实际就读1年以上(含1年),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考试,除国家专项计划外可以报考区内外普通高校;2.2022年参加高考的考生须具有西藏户籍2年以上(含2年)、西藏所属高中阶段学校学籍2年以上(含2年)、在藏高中阶段学校实际就读2年以上(含2年),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考试,除国家专项计划外可以报考区内外普通高校;3.2023年及以后参加高考的考生须具有西藏户籍3年以上(含3年)、西藏所属高中阶段学校学籍3年、在藏高中阶段学校实际就读3年,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考试,可以报考区内外普通高校。”

此前只要在西藏购买合法房产,把户口迁到西藏,有西藏的城镇户籍,不过学籍就可以报名参加西藏高考。西藏有关部门曾回应称:“购房入户”考生是经过户籍审查后,通过购买具有合法所有权的房屋转移户籍,与我区城镇居民享受平等的教育政策,不属于“高考移民”。这本是方便在西藏落户、工作、学习的政策,却被一些人用来运作“异地高考”。针对这种运作,当地教育考试部门及时做出政策调整。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一些省市。很显然这和国家开放异地高考,给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的高考升学机会的初衷是背离的。为推进异地高考,又防止高考移民,就必须调整高考报名条件,严格高考报名资格审核。实行“户籍+学籍双证制度”就成为各地的现实选择,具体而言,既要求有本地户籍,还要求有本地学籍且实际就读,不能学籍空挂,同时,提出户籍和学籍的年限,3年户籍加3年学籍,是不少地区的“标配”。

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深入高考制度改革,缩小各省的教育发展差距与高考录取率差距,建立基于学籍的高考报名制度,以学籍作为报名的依据,并在国家层面按学籍人口的变化动态调整高考录取指标。最近,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要进一步加强高考报名资格审核,严格审核考生的户籍、学籍和实际就读情况,采取有效措施标本兼治“高考移民”,切实维护高考招生秩序。

来信 用好压岁钱 适应新年俗

宋维宙

和往年春节一样,孩子们都会收到数额不菲的压岁钱。收到压岁钱,孩子高兴,家长却纠结了,因为有的孩子拿到钱就开始胡乱花,逛超市、买玩具、打游戏,这令家长们很是头疼。如何引导孩子科学合理地使用压岁钱,成了家长们关注的话题。

压岁钱即为压祟,古代的时候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最初的压岁钱只是徒有虚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可以流通消费的货币,而是只具有象征意义的钱样载体,上面刻着吉祥语。压岁钱的初心是长辈对孩子的祝福和关怀。

那么,当下引导孩子科学合理地使用压岁钱,家长首先要让孩子正确认识压岁钱的意义,让孩子明白压岁钱的“前世今生”。其次,和孩子一起制定可行方案。每个家庭的做法可能不同,但都应适应“厉行节约”“用之有度”的新年俗。有理财专家就建议:把孩子的压岁钱分成三份,一份用于合理消费;一份存入银行;一份与他人分享——用于帮助急需帮助的人。这个建议,为孩子胡乱花钱设置了障碍,让压岁钱利人利己,更好地发挥价值,家长们不妨一试。

本版邮箱
meiripinglun@vip.sina.com

严查投机炒房是今年楼市调控重中之重

本报评论员 樊大斌

今日社评

近日有媒体报道,2021年春节假期楼市成交呈现明显的地域分化特征,三四线城市楼市成交遇冷,而一线城市城市新房售楼处“不打烊”、二手房带看正常,北京、广州、深圳春节期间成交创近三年新高。

一些媒体报道的楼市“井喷”,其实主要是指一线城市的个别热点地区成交热络,并不能代表目前一线城市楼市整体交易状态。近期,北京、广州等城市楼市淡季不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以往春节不同,今年春节楼市受益于“就地过年”,多个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因此高于往年同期。有统计显示,30个重点城市在春节周成交量同比上升了133%,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幅也达34%。还有数据显示,北京、广州等热点城市春节期间累计成交量创3年来新高。

近期发布的一系列牛年春节假期消费数据引人关注,无论是快递包裹数量、春节档电影实时总票房,还是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的销售额,均是刷新了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今年要抓好的若干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会议指出,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

纪录。其他春节假期消费数据的火爆,可以视为奔涌社会活力的体现,唯独部分楼市“井喷”的销售数据,令人感到暗藏着隐忧。

事实上,春节前夕,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监管部门已多次发文,要求严查违规资金进楼市问题,防止出现局部量价上涨苗头。核查发现,一些城市存在经营贷、消费贷等违规流入楼市情况。例如,某购房者于2020年新注册了一家企业,该购房者之后网签了该区重点学区一套二手房,在随后几个月里,该购房者先后从两家银行申请数百万元经营

贷。另外,还有购房者无法“凑够”首付资金,通过“假流水”等方式申请个人消费贷款或小微企业房抵经营贷等凑够首付资金用于购房。

牛年春节假期一些城市楼市成交“井喷”,其中是否存在违规资金流入问题,目前还不得而知。但相关风险需要高度警惕,必须严格核查,要坚决防范经营贷等流入楼市。去年,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房地产销售市场从“冰冻”状态快速恢复,一些城市甚至是深“V”反转,一度出现“众筹打新”“万人抢房”等不正常现象。之后,全国

多地出现新一轮房地产调控加码态势,不断出台调控举措,热点城市楼市这才逐渐降温。牛年伊始,房地产市场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投机炒房、渲染炒作,再次趁机而出,应迅速采取针对性调控措施,确保楼市稳定。

严查各类投机炒房,是今年楼市重中之重。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今年要抓好的若干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会议指出,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

楼市平稳健康发展离不开“房住不炒”定位。楼市明显升温甚至再次大幅反弹,势必带来更大民生问题,势必累积和加大金融风险。面对楼市可能出现的“暗流”涌动,各地应以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为目标,采取更加有效有力的精准措施,巩固楼市调控成果,确保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纵深话题

设立“全民抗击疫情日”很有必要

胡建兵

针对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设立“全民抗击疫情日”,国家卫健委官网2月18日发布的《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594号建议的答复》称,该建议对于总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验、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动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具有积极意义,将认真研究吸纳。

去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一次“大考”。

目前,世界和我国关于公共卫生和防疫方面已有一些节日纪念日,如爱国卫生

月、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世界艾滋病日等。2020年全国“两会”有其他代表委员提出设立“国家公共卫生日”等,不管这个纪念日名称是什么,设立这样的纪念日,不仅有利于弘扬伟大抗疫精神,提高人民群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认知水平和预防自救互救能力,也有利于优化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协作,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对于总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验、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动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2003年的非典疫情,使全国人民意识到了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带来的影响,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虽然全

国各地加大了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和公共卫生制度的建设的力度,但一些地方好了伤疤忘了疼,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对我国公共卫生防疫发出了警示。设立“全民抗击疫情日”可以通过纪念活动等,深入宣传公共卫生知识,提高国民防护意识,完善政府应急管理机制,时刻准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同时提醒各地不能再好了伤疤忘了疼,要时刻把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伤痛铭记在心,不定期地把这次疫情当成“突发公共卫生警示课”去教育全社会。

世界很多国家都有用纪念日的方法来标示一个民族或全人类的重大事件,以

唤起公众的意识和广泛持久的支持。设立“全民抗击疫情日”,就是进一步唤起和增强公众的公共卫生理念、提高公共卫生安全的认知,有利于社会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倡导现代与文明的生活方式。当今的中国公共卫生发展急需体系的完善或重构,也比任何时候更需要文化基础和社会的支撑,设立“全民抗击疫情日”,使警钟长鸣,让国人铭记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教训。希望有关部门能认真听取各方的意见,对设立“全民抗击疫情日”进行认真评估,这不但可以提高对新冠肺炎疫情这类重大疫情的关注力度,也可以对其他公共卫生事件等加以防范。

一种说法

手机统一保管有助于管理责任落地

唐伟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下发,北京市教委在此基础上,对各区和学校提出“北京版”中小手机管理要求,明确手机保管的工作制度和规范,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避免手机丢失或损坏。市教委还表示,各区要加强对学校工作的指导,将学校手机管理纳入日常监管,加强工作检查,建立通报整改制度,确保工作落实。

手机作为最主要的电子产品,对未成年人成长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已到了非限制不可的地步。调查显示,儿童每天持续用平板电脑1至2个小时以上,三个月视力就可以从1.0下降到0.5左右。青少年玩手机的伤害远不止于此,美国一项研究显示,孩子如果每天使用智能手机、电脑和电视等终端电子设备的时间超过1小时,会伤及心理健康,主要体现在内心幸福感差,焦虑或抑郁风险高,自我控制能力和情绪稳定性差,好奇心不断下降。

很多人认为手机等电子产品对学习会带来帮助,其实是一个认识误区。据调查显示,携带手机上对学习成绩大的弊的也不会超过5%,除此之外绝大多数人未能从中受益,反因自控不力而深受其害,难以集中精力而对学习带来极大的影响。在此情况下,限制学生在校内携带和使用手机,关乎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不过,由于手机属于私人物品,需要明确管理权限才能避免侵犯个人权利。



当下,管理手机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已有广泛共识,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依据,2018年8月,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各学校也对禁止带入作出了明确的要求。不过,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则和责任分解,也就没有落实常态化的管理措施,“禁止令”并未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应有的作用。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延续了之前的规定要

求,又作出了具体的措施性安排,包括实行手机统一保管的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谁来管”“怎么管”两个问题,也填补了之前的执行困境。

手机实行统一管理的模式,至少解决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将管理的权限下放给学校和老师,赋予了其日常管理权。有了法定授权,以老师为代表的学校管理者就可以消除顾虑,大胆履行自身责任并开展管理。另一方面则是解决管理方式难以统一的限制。手机管理作为学校管理的重要内容,理应遵循管理的公平

性、普适性和高效性等原则,实行统一管理就能消除特殊的例外,实现管理学中最基本的“公平性”原则,为解决管理阻力提高管理效率打下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统一管理模式的简便快捷为提高管理的效力创造了条件,实现了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统一管理模式下,学生手机的上缴、使用等行为都会有具体可循的规则,也令手机管理实现“以学生为主”向“以管理为主”转变。过去手机管控难,就在于“以学生为中心”的导向机制下,管理者必须充分尊重个性化和个体化要求,无法采取统一措施,执行时难以做到高效精准,往往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放任自流置之不理,要么剑走偏锋过犹不及,采取了砸打等暴力方式,违背了法治原则也背离了教育初衷,教育者的责任也很难真正得到体现并发挥作用。

手机实行统一保管有助于责任落地,其间既包括硬件的完善,比如具备保管手机的场所和设施,又包括具体的管理方式和责任人,让管理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在此基础上,还会辅以家校沟通与协作,学生行为的教育与管理,违规行为的惩戒与引导,必要使用的满足与规范等,以综合手段的运用达到管理效果最优化。总之,手机作为学习的非必需品,只有真实管实管和严管,才会达到社会认知与行动的高度统一,以手机管理实现教育管理的上档升级。

足球场被用于赶集 体育功能岂能异化

丰收

20日,一则贵州省都匀市某足球场被用于赶集而遭到损坏的消息引发网友热议。对此,都匀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在20日晚回应称,为满足春节期间群众赶集需要,因此将此区域有限地临时作为赶集区域,目前该足球场内破损的人工草坪已修缮完毕,并明确不再将该区域作为赶集区域。

从网上流传的视频和照片看,虽说破损的草坪已被修补,但“足球场被用于赶集”事件本身,值得思考的问题有很多,比如是足球场闲置被利用还是当地不重视足球?

不少网友提出质疑:“我们踢球找不到球场或者球场贵,你却拿来赶集!”虽然这是一个个例,但足球场功能被异化,不免让人与中国足球现状联系起来。不可否认,春节期间赶集对当地居民

来说也很重要,疫情防控期间不能出现人员密集。但是,当地果真没有其他场所用于居民赶集吗?应该说还有其他选项,但为何非要占据足球场,这需要有关方面给出充分理由。不能排除的一种情况是,足球场临时出租给摊贩可以收到一些摊位费,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把足球场用于赶集都是站不住脚的。其一,影响当地足球爱好者踢球。即使只在春节期间的一段时间占据足球场,也会影响正常踢球。其二,向球迷和公众释放出当地不重视足球的信号,或影响部分人对于足球的兴趣和信心。其三,这一决策明显不符合我国相关体育制度政策精神。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足球发展。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2016年,体育总局、教

育部共同编制了《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2019年,国家发改委等三部联合印发《全国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原因在于足球场设施供给总量不足。

一边是足球场供给不足,一边是足球场被用于非足球活动,这种现象显然无法让人接受。从制度角度来说,“足球场被用于赶集”同样不符合规定要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规定,开展与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功能、特点相适应的服务。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单位不得将设施的主体部分用于非体育活动。

虽然上述条例留出个“口子”——因举办公益性活动或者大型文化活动等特殊情形临时出租的除外。但足球场被用于赶集,是否符合公益性活动等特殊情况规定,还值得探讨。国家体育总局2015

年印发的《体育场馆运营管理办法》规定,体育场馆应当按照以体为本、多元经营的要求,突出体育功能……

无论是从规定来看,还是从实际情况来说,“足球场被用于赶集”既背离了体育制度精神,也背离了体育设施功能用途。对此,不能用一句“明确不再将该区域作为赶集区域”来应付,而是应该依照相关规定追究决策者的责任——这或许能起到警示作用,才能化解公众对该足球场功能“异化”的不满。



下载北京头条App
让现在告诉未来